

编者按: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

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些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深入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光明日报》陆续刊发专家学者解读文章。本报继续予以转载。

## 民厚生、义利兼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⑥

□ 谌国庭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习近平总

放眼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追求共同富裕是今日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和价值追求,也是中华民族的先圣先贤们“富民”思想主张的当代体现。“厚生”一词的起源比“富民”更早,可以追溯到我国现存最早的古文献汇编《尚书》。《尚书》是儒家“五经”之一,其《大禹谟》篇强调善政有“六府三事”,六府指的是人民物质生活中的“金、木、水、火、土、谷”,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唐代初年著名经学家孔颖达在为《尚书》作注疏时,专门解释道:“厚生,谓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尚书》所谓“六府”与“三事”,合称“九功”。六府和正德、利用二事,其核心导向和指向均为“厚生”。“厚生”展现了深厚的富民养民情怀,是善政的标志与目的,也是善治的体现。

“富民”一词最早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管子》一书。《管子·治国第四十八》开篇即写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与管子的思想相似,孔子同样十分看重百姓富足的重要性,视之为政之要义。《论语·颜渊第十二》记载,孔子在回答学生子贡问政时提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把实现百姓的丰衣足食确立为经济、政治、社会安定的三大原则。在《论语·子张第十三》中,面对冉有“既庶矣,又何加焉”和“既富矣,又何加焉”的疑惑,孔子给出了“富之”而后“教之”的答案,明确提出“先使百姓富足,再进行教化”的主张。此间所言的“富之”和“足食”事实上都是“富民”的观念。孔子的学生有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进一步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强调了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前提和基础。

“义利兼顾”的观念是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呈现给当代世界各国的又一思想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价值观,与西方政治文化的理解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英国19世纪三度出任外交大臣、两次担任首相的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名言”不仅是英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主张,也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追求利益最大化、功利主义,成为西方政治文化的真实写照,也是西方政治思想、政治文化中的严重硬伤。作为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义利”关系的精彩论述。孔子在《论

语·里仁篇》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从而给“义利”之辩划定了明确框架,为后世儒家的“义利”争辩确立了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荀况在阐发孔子思想时提出了“以义制利”的观点。《荀子·大略》写道:“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又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况“义利两有”的主张,既克服了片面追逐自身利益、见利忘义的自私与狭隘;又避免了片面推崇“存天理、灭人欲”所导致的自我压抑的消极倾向。荀况“以义制利”的观点,涉及如何正确处理争取自身利益与尊重他人合法权益的问题,与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内核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相互印证、相互注解。“义利兼顾”的理念,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且具有十分明显的世界意义。它不仅是中国齐治平的准则,还为当今各国处理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提供了独特的中华智慧。

把“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思想观念放在一起强调,构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伦理观。这一观念既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可以说,实现“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主张和政策追求,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原载7月11日《光明日报》)

##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⑦

□ 董建霞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列举的重要元素之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机关体的宇宙观、生态观,彰显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

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在强调人与自然共生的同时,也认为人应当善待自然,对自然资源取之有时、用之有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满足人民自身需要与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大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贯穿于诸子百家的经典文献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曾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庄子看来,人和自然万物同属天地造化的产物,共处在一个有机统一体当中,此之谓庄子的“齐物论”。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道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强调人与自然之整体有序和谐状态。董仲舒通过将阴阳、五行学说合而并用,提出“天人同类、相感相应”之说。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文化传统,有利于铺就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是共存关系,相即相容、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共同维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万物并育”出自《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句话的原初意义是强调万物并育不相妨害、道路并行互不冲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宽广胸怀、深厚仁德和高明智慧的理想境界。从生态视角来看,意味着自然中的每一个体、每一对象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它们可以共同存在,彼此之间并不相互排斥。在“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所表达的人与自然万物共同存在、统一于大自然的生态观念,今天愈加彰显其恒久价值,为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提供了宝贵的文化源泉,梳理出明晰的思想脉络。

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生态哲学的创新,不仅推动了我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倡导以系统性、整体性观念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不仅体现了对自然规律更深层次的把握,还是人类实现永续发展的追求和理想,为全球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更好范式,和世界贡献人与自然和谐之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原载7月12日《光明日报》)

##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⑧

□ 夏莹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习近平总

行合一的问题,强调知和行相辅相成,“只有把道理真正弄懂了,行动才能自觉持久;只有行动上落实了,对道理的领悟才能更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行关系的重要论述一方面吸收了中国古代知行观关于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相统一、相促进的观点,将其运用于道德建设,特别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去;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突破了单纯道德实践的束缚,拓展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实现了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标志着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实事求是最初出现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景帝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在给这段话作注时写道:“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说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求得正确的结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知真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即是知,“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观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知行合一讨论的主要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观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总体上属于一种道德修养学说。1941年,毛泽东同志依据革命实践的需要,发

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其中借用了实事求是一词,并予以新的解释:“‘实事求是’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是指从实际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由此,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重要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为什么要坚持实事求是,如何坚持实事求是作出深刻论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进一步提升了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知”和“行”的关系同样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典型命题。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立足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就把传统知行观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高度。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事求是、知行合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两个结合”,实现了从传统哲学命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从理论问题到解决现实问题之强大武器的“两次转换”,成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机构成。

回首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用“实事求是、知行合一”这把钥匙,打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又一个又一个关键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又一个新境界,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历史命运。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原载7月13日《光明日报》)

1941年,毛泽东同志依据革命实践的需要,发

习近平总书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智慧,凝聚着崇高的价值追求,承载着美好的道德愿景,一直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主要在《中庸》一书中得到集中阐述,原文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两句。其大意为做事时要抓住过和不及这两个极端,调和起来采用适中的做法,既不能过于保守,也不能过于激进;执守住中道以达致天地和谐运行、万物并生而不停的中和状态。

中华文明从其源头就形成了尚中、贵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早可追溯到上古五帝时期。一讲轩轾居中央之地,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有土德之瑞,故尊称为黄帝,古人即以中为尊,求中致和。先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体认到“中”和“和”的价值意义,发现“中”和“和”与“好”“对”“行”“成”之间的规律性联系,自然就追求“中”和“和”的思维和行为方法。《易经》有“中行无咎”“阴阳相合”的思想,老子《道德经》中也强调“不若守中”“知和曰明”等。孔子首创“中庸”一词,把中庸之德誉为“至德”,并言其为己“一以贯之”之道。

首先,守中即守正。“中”为本、为正。《中庸》开篇即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中即正。”程颐解释:“中者,天下之正道。”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所以,“中”给出了最高的参照标准和最终的合法性原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和底线。

其次,执两用中。“中”为适中、适度、适宜。《论语·为政》有云:“攻乎异端,斯害也矣。”孔子特别强调过和不及都是极端,都不得其“中”。只有全面掌握两端,才能“择乎中庸”,从两端中取出适当的“中”来。可见,用中既不是“乡愿”式的一味折中调和,也不是机械地、僵化地取两端平均值,而是在两端之间巧妙找到恰好、正好。

再次,尚中以求和。用中、守中不是以“中”作为统一性取消多样性,而是达成“和”,即多样性和谐统一理想状态。孔子中庸思想的最高意境,不止于中,而在乎中和。“和”是“中”的目的和价值归宿。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希望终结社会的冲突和动荡,使国家上下相合,达到安定祥和的政治局面。因此,达到中和需要更高的承载——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以仁爱、至诚、宽容为底色,内含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伦理要求,是走向中和的道德践履。正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言:“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

最后,时中。中和、平衡的状态不是固定不变的,要根据事情的变化和发展不断调适来维持中道。《论语·里仁》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处理天下的事情,没有固定不变的要怎样做或者不怎样做,而是适合情理,随着变化而变化。孟子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能够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通权达变不违仁,非孔子莫属。《孟子·尽心上》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以“嫂溺救援”的例子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中庸之道权衡轻重、随时而变,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的高妙之处。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用唯物辩证法解释过犹不及,在中庸朴素辩证智慧中注入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元素,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著名理论范例。他说:“过犹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不及量的矛盾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他认为过与不及的错误在于没有选择最能符合事物发展的度,没有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理论和实践相符合。就这样,在“两个结合”的必由之路上,我们党始终在理论与实践上扎实推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自觉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譬如“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矛盾观、“蹄疾”而“步稳”的发展观、善于把握全局及长远的系统观念和战略思维、识应变求变的创新思维、划出红线与亮明底线的法治观念和底线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以及文明多元共生、交流互鉴、和谐共处的思想等,既部署了“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了“桥或船”的问题,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原载7月14日《光明日报》)

## 讲信修睦 亲仁善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⑩

□ 刁大明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在讲话中,总书记列举了共同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多个重要元素,其中包括“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值得注意的是,“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并列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智慧结晶之一,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向国际社会展示的大国风范、交往之道。

“讲信修睦”,源自《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其基本含义为,各国之间要相互讲信修睦、要建立和睦关系。这句话所记载的是孔子在参加祭祀之后触景生情、发出的关于自身所处时代政治秩序的叹息与期盼。“亲仁善邻”,则出自更早的《左传·隐公六年》,即“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之”。其基本含义是,一个国家应该亲近善人、友善邻国。其所描述的场景是,陈仲雍劝谏陈桓公要将“亲仁善邻”作为国家最宝贵的方略,应同意陈国的请求。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当中,信、睦、仁、邻等理念共同汇集为中华民族对天下有序良性互动及理想秩序的持续追求与不懈探索。

“信”是立国之本,更是国家间保持良好交往的根本基础。《管子·权言》曾言“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提出正确义利观,倡导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要求。2013年在印尼国会演讲时,总书记曾提到“人与人交往在于言而有信,国与国相处讲究诚信为本”,凸显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大国尤其要作出表率,带头讲平等、讲合作、讲诚信、讲法治,展现大国的样子”。

“睦”为国家间交往设置和了亲和亲近、守望相助的和谐目标。《广韵·屋韵》有云:“睦,敬也……亲也,又和睦也”。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中国一直追求和传承的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决定着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关键角色定位。2023年5月中国—中亚峰会成功召开,总书记再次提出了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重要目标,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国之间的和睦和谐指明了方向。

##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⑨

□ 董冰

“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

(原载7月14日《光明日报》)

(原载7月17日《光明日报》)